

搭建小窩開「藝術派對」盡情交流

趙半狄：以藝術融化冰冷現實

繼上海之後，中國當代藝術家趙半狄在武漢搭了一個自己的小窩。今年3月底，疫後的武漢，漢口最繁華的中山大道與南京路交匯處的一棟歷史建築——武漢美術館，展廳中一個「荒島餘生」般的場景不斷吸引着玻璃幕牆之外路過的武漢市民駐足。地上鋪滿了厚厚的竹葉，散發着香氣，一個巨大的藍色口罩吊床，一間用毛竹搭建的窩棚，趙半狄在竹葉上鋪上墊子，備好氣泡酒和飲料，與武漢的觀眾們促膝交談。長達3個月的小窩派對就此開始，他所重視的與外界的連接和交流，在這場派對中也鋪排展現了開來，因為「連接是一種溫暖」，若同時能用藝術融化一點點現實中的冰冷，他便已經知足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
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去年6月27日，曾因疫情被困新加坡的趙半狄飛回上海，隔離階段，關於小窩的創意雛形浮現出來。一座竹窩棚，有限的空間可供兩三人在其中促膝而坐，再布置一張自己的小畫，他解釋這在整個場景中代表自己情感的隱私部分。而厚厚的竹葉構成的屋外空間是他與外部世界和他人的連接，這種連接不設限制、不設話題、不設形式，完全地開放。屋外空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口罩吊床，場景中一抹最亮的藍。疫情中保護每個人的口罩，在趙半狄的創意中成為一張吊床，在隔離時他就用口罩和筷子嘗試搭建這張吊床的模型，前來小窩拜訪的人可以躺在其中，感受到襁褓一般的溫暖和安全。他認為，將藍色外科口罩放大成吊床，是創作中的運氣，就像畫畫的時候發現了一抹色彩，令整幅畫開始有了呼吸。

傾訴與沉默皆具意義

中國的疫情已經平息了大半年，撫平疫情對人的心理衝擊，慢慢成為很多人討論的話題。趙半狄的小窩在此時亮相，自然讓人更多地理解成，這為疫情中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心理療愈的藝術解決方案。

趙半狄卻告訴記者，在人類面對疫情「大洪水」的時刻，他呈上這樣一個作品，是心存一點兒「道義」的，但也不用拔高其中的「責任感」。他坦承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，熱鬧的藝術派對只是自己用最樂觀的方式去表達片刻的歡愉，若同時能用藝術融化一點點現實中的冰冷，他便已經知足。

趙半狄很看重小窩對外界的連接，因為「連接是一種溫暖」。他相信，藝術是同情和解放的方式，小窩是一個屬於趙半狄的「諾亞方舟」，他希望自己的藝術首先能夠融化自己，順便也能融化身邊的世界。為此他創造另一個維度：竹子小窩、小窩裏的畫、口罩吊床、還有迎接朋友們的到訪……堅硬冰冷的現實，在這裏呈現出正在融化的模樣。

武漢的小窩不斷迎來在疫情風暴中

心劫後餘生的市民、醫護人員、志願者、快遞小哥、司機、物業工作者……疫情一年多之後，在小窩厚厚的竹葉上促膝交談，各種情緒在小小的空間內迅速地轉換，悲傷、凝重、委屈、感恩、振奮、釋懷……小窩營造的氛圍讓多數的參與市民都表現出格外的傾訴慾望。而趙半狄則更持開放的態度，他認為小窩並不只吸引大家傾訴，經過災難，淡定和沉默在小窩亦有意義。

小窩讓人與世界連接

早在中央美院一畫室的學生時期，趙半狄就被業內譽為「繪畫天才」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他毅然放棄如日中天的繪畫，成為「熊貓代言人」，之後更是以多個派對行為藝術作品被外界稱為「派對之王」，成為中國當代藝術中最具爭議的藝術家。與過往的極端轉換不同，小窩結合了「派對之王」趙半狄和「繪畫天才」趙半狄，他自認這如同結合了自己的分裂人格。武漢的竹窩棚裏布置的一件小幅油畫，是他在開幕前一小時完成的，畫面中一隻手緊抓着另一隻戴着透明手套的手。他覺得他的畫作應該出現在最配得上它的地方，而代表隱私的竹窩棚正是陳列他的繪畫最迷人、最恰當的場所，這幅油畫在整個場景中如同他的「心跳」。而窩棚外的空間，承載着藝術派對的熱鬧。被吸引前來的武漢市民在小窩前臥坐輾轉，趙半狄則備好酒水，讓大家盡情交流，聆聽他們的訴說，這就是連接趙半狄與外部世界的藝術通道。

最近兩三年，在「派對之王」趙半狄熱衷於創造一個個熱鬧的藝術派對的時候，另一個「繪畫天才」趙半狄開始回到畫室裏，踏實地坐在畫布面前。究其原因，他坦承，「與這個世界交手之後，我逐漸對所謂『真相』感到失望，而更加在乎『表象』。繪畫這位老情人，此時的歸來，有了新人的容貌。」不變的是趙半狄對繪畫藝術的追求，即卓越美感，他相信卓越繪畫的辨識者和欣賞者屬於人群中的少數，繪畫並不算「緊隨時代」的

藝術樣式，更別提卓越的美感，所以趙半狄堅信，這樣的追求一定是逆行者才有的氣味兒。

而回歸到自己的藝術理念，趙半狄覺得藝術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「逃離」，不論這幾年的派對還是繪畫，即便看上去和所謂現實狀態契合，其實那不過是他自己逃脫或出發的那個踏板而已。畢竟，藝術和現實並不屬於同一個空間的事情。



●放置在竹窩棚裏的畫是趙半狄的「心跳」。

●武漢市民聚集到趙半狄的小窩傾訴疫情經歷。

俞鯤 攝



●疫情期間，滯留在新加坡的趙半狄在戶外寫生。

聆聽

專注創作 走出沮喪情緒

去年一月，趙半狄前往新加坡旅行，原本準備在一周後回國，但卻因為疫情被困在當地，當時新加坡單日確診人數過萬，疫情也極其嚴峻。面對波及世界的「大洪水」般的疫情，沮喪的情緒瀰漫他的內心。在他眼中，「疫情只是人類面對的眾多苦難傷痛之一，焦慮和迷茫是疫情戲劇化地逼迫人類作出的反應」。被困新加坡的日子很煎熬，趙半狄帶著為數不多的顏料，拿起畫筆，走上大街寫生。即便身處疫情之中，畫畫的時間過得非常快，幾個小時眨眼之間就過去，他感嘆，專注於創作時連時間都變得不一樣，那種美好的感覺極其真實。



●趙半狄認為，將藍色外科口罩放大成吊床，是自己創作中的運氣。

作家梁曉聲 一個時代的書記員

以115萬字三卷本《人世間》於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之後的一年，梁曉聲又推出一部全新長篇小說《我和我的命》。斯時，這位作家已經71歲。新作關於女性命題的書寫，再次擊中時代的靶心。有評論家如是評價梁曉聲——他是一個對現實高度關注的人，一個時刻把自己放在時代漩渦中的作家。正如梁曉聲的自況，「作家不可避免成為一個時代的書記員」。

「她」，令作家念念不忘

作為一個密切關注現實的作家，從最早的《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今夜有暴風雪》等關心知青的命運；到現在，梁曉聲最關心普通底層人民的命運。

長篇小說《我和我的命》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寫了普通人的奮鬥史：一個1982年出生的女性，出生後被遺棄，但在隨後的人生成長中的奮鬥。

梁曉聲表示寫這樣的人物已經想了很久，曾經他在一篇舊文中寫過，「如果有上着的話，給我的感覺是，它似乎有意識的、分批次地讓某些貧困的家庭選送責任的種子，當這些子女們長大之後成為這個家庭的責任成員，他們能撐起那樣一些貧困家庭的屋頂。」

他至今記得2000年收到的一封信讀者來信，說她小姨就是這樣的女孩，最早離開



●作為全國政協委員，梁曉聲常就文化教育發展議題提出建議。

新華社



●梁曉聲青年時期生活照。他稱自己也曾是個「憤青」。

資料圖片

貧困農村到深圳打工，不但把幾個姐姐孩子的工作安排在了深圳，甚至村裏張家、李家都會到深圳找她，感覺她的那個小房子非常像某村辦事處。「那個小姨早晨起來找鞋子要上班的時候，像跳芭蕾舞一樣，在孩子們之間跳來跳去，因為沙發上、床上、地上已經睡滿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，這個細節給我深刻的印象。」

因為這個印象太深，梁曉聲始終就覺得，這樣一個小姨的形象應該擺放在他哪部作品中。「在《人世間》，我沒有餘地把她放進去。這是我的一個遺憾，所以這個初心一直在糾纏着我，完成了《人世間》之後，我覺得我要為這樣的小姨單獨

立一個傳，她不只是一個個體，她代表着那個年代許多這樣肩負起家庭的，家族的，扶貧責任的一些孩子們的身影，所以也是使我非常感動的一些青年。」

「人」，要有為人的善良

梁曉聲坦言，十多年來一直想寫關於八十後的青年，寫他們在剛步入社會、參加工作後的人生，給所有的八十後鼓鼓勁，尤其給那些在北上廣拼搏的八十後們，希望給他們帶來一種動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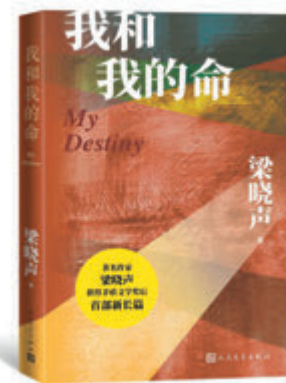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的觀察中，當八十後大學畢業時，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。「我在那個年代已經是『憤青』了，對於那些出身強於

別人、還擁有優渥資源的同代人，有一種忿忿不平。我們那時候大學畢業生還是天之驕子，而現在的八十後不僅要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，還有更大的收入差距、生活品質差距，直面這些差距，還在繼續努力工作，我挺佩服這些年輕人的。」

小說聚焦於「命運」這個主題，並提出人有「三命」：一是父母和原生家庭給的叫「天命」，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「實命」，三是個人文化給的叫「自修命」，梁曉聲進而總結「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」。如同書中的「我」，因為是女孩被父母遺棄，命運隨之轉變，從農家到了知識分子家庭，此後「我」在深圳找到愛情、收穫友情、感悟親情，然而「命運」卻要我交出不到40歲的生命……與此同時，原生家庭的親情綁架從未停止，生活在底層的親人提出各種要求，「我」雖然憤怒無奈，卻也總是不能袖手旁觀……

一以貫之的是，他依然想通過此書來傳達，作為人最重要的善良。

在書的結尾，他寫了一句話：「我善良、我寬容，我堅韌，我成為我。」在梁曉聲看來，如果一個人不善良，如果我們從小都沒有對他（她）進行善良教育，他（她）以後絕對沒有任何事業可談。即使



●長篇小說《我和我的命》

網上圖片

他（她）憑分數進了大學，以後的人生也是堪憂的。

在梁曉聲一篇《普通人要怎麼度過自己平凡的一生？》的訪談中，他提出「一個時期以內，我們的文化形態存在着我不以為然的現象，一種對於金錢財富和地位的過分的、巨大泡沫般的追捧。而這實際上是對平凡普通人們存在價值的一種危害和殺傷。」

而他寫《我和我的命》的衝動在於，要通過這本書確立普通者的作用和尊嚴，普通者可敬的那一面。「文化給我們的一種好處就在於，可以適時提醒我們調整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思考退一步海闊天空。不但要經常問自己，你到底是什麼，還要經常問自己，什麼才是夠？多少才是夠？我覺得把這些都和自己對話清楚了之後，可能人生會相對變得壓力減輕一些。」他在文中說。

作為與新中國同齡的作家，梁曉聲透露自己確實已經在有意識地退場了，也毫不掩飾自己已經寫累了。他現在已經有很嚴重的頸椎病，或許還會寫，但也已經有着抽身離去、不再寫作的準備。 文：中新社